“庄生传颜氏之儒”：章太炎与“庄子即儒家”议题

杨海文

摘要：章太炎至少有五种文献涉及“庄子即儒家”议题：早年两种尚属消极评论，晚年三种已是积极参与。“庄生传颜氏之儒”是其画龙点睛之笔：颜子一系儒学由庄子传承，庄子是颜氏之儒的传人；传颜氏之儒的庄子是儒家，而不是道家；坐忘不是道家的本事，而是儒家的至境；即使庄子后来成了道家，但他当时也是以儒家身份，把颜子坐忘的工夫与境界记载并传承了下来。由章太炎晚年的积极参与可知，“庄子即儒家”议题不是人们习以为常的儒道互补之思所能范围，而是具有独特的思想史内涵，理应获得自身的思想史地位。

关键词：庄子；颜子；庄生传颜氏之儒；“庄子即儒家”议题

庄子与儒家有着密切的关系：从庄子是道家看，这种关系隶属于儒道互补之思；从庄子是儒家看，这种关系转换为“庄子即儒家”议题。前者是传统观点，众所周知；后者始于韩愈(768—824)，津津乐道者不少，知其详情者不多。“庄子即儒家”在儒道互补之外，创新并丰富了庄子与儒家的思想史关联，开显并证成了奇正相生的辩证之境。庄学大师章太炎(1869^①—1936)至少有五种文献(早年两种、晚年三种)涉及这一议题，并以“庄生传颜氏之儒”为其画龙点睛之笔，可让我们管窥“庄子即儒家”议题的历史衍化及其独特内涵。

一、“率尔之辞”

1906年9月，旅居日本的章太炎接任《民报》主编，并成立国学讲习会。《章太炎年谱长编》(增订本)记述：“国学讲习会出有《国学讲习会略说》，铅字排印本，日本秀光社印行，1906年9月出版，署黄帝纪元六百四年^②，收《论语语言文字之学》、《论文学》、《论诸子学》三篇。《论诸子学》，即同年七月二十、八月二十日出版之《国粹学报》丙午第八、第九号所载章氏所著《诸子学略说》。”^③

《论诸子学》指出：

或谓子夏传田子方，田子方传庄子，是故庄子之学，本出儒家。其说非是。《庄子》所述如庚桑楚、徐无鬼、则阳之徒多矣，岂独一田子方耶？以其推重子方，遂谓其学所出必在于是，则徐无鬼亦庄子之师耶？南郭子綦之说为庄子所亟称，彼亦庄子师耶？^④

作者简介：杨海文，孟子研究院尼山学者特聘专家(山东邹城 273500)、《中山大学学报》编辑部编审(广东广州 510275)。

基金项目：本文受“山东省儒学研究高端人才——尼山学者工程专项经费”及中山大学“三大建设”专项资助。

① 章太炎生于农历一八六八年十一月三十日，系公历1869年1月12日。年谱常用农历，余者通行公历。

② 1906年当为黄帝纪元4603年，而非604年。此一笔误，汤志钧一直未予更正。参见汤志钧编：《章太炎年谱长编》上册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9年，第216页；汤志钧编：《章太炎年谱长编》(增订本)上册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3年，第125页。笔误是否源自秀光社排印本，待考。

③ 汤志钧编：《章太炎年谱长编》(增订本)上册，第125页。

④ 朱维铮、姜义华编注：《章太炎选集》(注释本)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1年，第371页。

韩愈是“庄子即儒家”议题的第一推手,其《送王秀才序》有言:“盖子夏之学,其后有田子方;子方之后,流而为庄周;故周之书,喜称子方之为人。”^①寻思这段话,最成问题的是第二句,第三句因其佐证第二句变得亦有问题。蔡元培(1868—1940)在留德期间写的《中国伦理学史》中评价曰:“其说不知所本。”^②章太炎拿第三句开刀,藉此证伪第二句,得出“其说非是”的结论,明显不赞成韩愈的说法。究其实,这类评论尚在“庄子即儒家”议题之外,并未入乎其内。

《章太炎年谱长编》(增订本)记述:光绪三十三年(1907)“十二月二十日(1908年1月23日),《国粹学报》丁未年(1909年)第十二号出版,‘社说’栏有《某君与人论国粹学书》二封,即《别录》卷二《与人论国学书》和《再与人论国学书》”^③。

《与人论国学书》指出:

至以庄子为子夏门人(《经解上》),盖袭唐人率尔之辞,未尝订实。以庄生称田子方,遂谓子方是庄子师,斯则《让王》亦举曾、原,而则阳、无鬼、庚桑诸子,名在篇目,将一一皆是庄师矣。^④

这里对“庄子为子夏门人”之说的否定及其证词,与《论诸子学》如出一辙。所不同者,它把矛头指向了章学诚(1738—1801)。《文史通义·经解上》云:“荀、庄皆出于子夏门人,而所言如是,六经之名,起于孔门弟子亦明矣。”^⑤《校讎通义·汉志六艺》云:“荀、庄皆孔氏再传门人,(二子皆子夏氏门人,去圣未远。)其书明著六经之目,则《经解》之出于《礼记》,不得遂谓剿说于荀卿也。”^⑥章学诚像韩愈一样认为庄子乃子夏门人,章太炎讥评其为“未尝订实”的“率尔之辞”。

章太炎手定的《国故论衡》及《太炎文录》未收《论诸子学》^⑦,《与人论国学书》则被收入《太炎文录初编》别录卷二。章太炎早年虽然注意到“庄子即儒家”这一议题,但并不觉得它具有足够的学术含量。《论诸子学》以“或谓”,《与人论国学书》以“唐人”指称韩愈,又先后断以“其说非是”、“率尔之辞”,轻蔑之意跃然纸上。大体而言,清末的章太炎只是“庄子即儒家”议题的消极评论者,还不是积极的参与者。

二、接着韩愈讲

1922年4—6月,章太炎应江苏省教育会之约,在沪讲授国学,共十讲。《章太炎年谱长编》(增订本)记述:“《国学讲演记录》(《申报》,1922年4月2日、8日、9日、16日、23日,5月1日、7日、14日、15日、28日,6月4日、11日、18日)。《国学概论》(曹聚仁编,1922年11月1日上海泰东图书局铅字排印本,一册)。”^⑧又云:“章氏讲演,曹聚仁曾将记录整理,于本年11月1日由上海泰东图书局铅字排印,以《国学概论》为题出版,记录较《申报》为详,间有《申报》所录而为《国学概论》刊落者。此外,另有张冥飞笔述的《章太炎先生国学讲演集》,1924年平民印书局再版本。”^⑨

由曹聚仁(1900—1972)整理的《国学概论》,流布极广,影响极大。曹聚仁晚年的《从一件小事谈起》曾把它与钱穆(1895—1990)的同名著作进行比较:“钱先生的《国学概论》并不坏,坊间还有许多同一课题的书;不过,全国大中学采用最多的,还是章太炎师讲演,我所笔录的那部《国学概论》,上海泰东版,重庆文化服务版,香港创垦版,先后发行了三十二版,日本也有过两种译本。”^⑩

① 韩愈著,钱仲联、马茂元校点:《韩愈全集》文集卷四《送王秀才序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7年,第212页。

② 高平叔编:《蔡元培全集》第2卷,北京:中华书局,1984年,第29页。

③ 汤志钧编:《章太炎年谱长编》(增订本)上册,第146页。

④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:《章太炎全集》(四),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1985年,第354页。按,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。

⑤ 章学诚著,叶瑛校注:《文史通义校注》上册,北京:中华书局,1994年,第93—94页。按,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。

⑥ 章学诚著,叶瑛校注:《文史通义校注》下册,第1021页。

⑦ 参见汤志钧编:《章太炎年谱长编》(增订本)上册,第138页。

⑧ 汤志钧编:《章太炎年谱长编》(增订本)上册,第399页。按,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。

⑨ 汤志钧编:《章太炎年谱长编》(增订本)上册,第397页。

⑩ 曹聚仁:《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》,北京:三联书店,1986年,第3页。

《国学概论》第三章《国学之派别(二)——哲学之派别》指出：

儒家之学，在《韩非子·显学篇》说是“儒分为八”，有所谓颜氏之儒。颜回是孔子极得意门生，曾承孔子许多赞美，当然有特别造就。但孟子和荀子是儒家，记载颜子的话很少，并且很浅薄；《庄子》载孔子和颜回的谈论却很多。可见颜氏的学问，儒家没曾传，反传于道家了。《庄子》有极赞孔子处，也有极诽谤孔子处；对于颜回，只有赞无议，可见庄子对于颜回是极佩服的。庄子所以连孔子也要加抨击，也因战国时学者托于孔子的很多，不如把孔子也驳斥，免得他们借孔子作护符。照这样看来，道家传于孔子为儒家；孔子传颜回，再传至庄子，又入道家了。至韩退之以庄子为子夏门人，因此说庄子也是儒家；这是“率尔之论，未尝订入实录”。他因为庄子曾称田子方，遂谓子方是庄子的先生；那么，《让王篇》也曾举曾、原，则阳、无鬼、庚桑诸子，也都列名在篇目，都可算做庄子的先生吗？^①

与《论诸子学》、《与人论国学书》相比较，《国学概论》戏论谁都可为庄子之师，此其大同；点名道姓批评韩愈，此其小异；让颜子出场，此其大异。

在章太炎看来，《孟子》、《荀子》论颜子，不仅少，而且浅薄；《庄子》不然，它对孔子既有赞亦有弹，对颜子却有赞而无弹，可见庄子极其敬佩颜子，“老子→(孔子→颜子)→庄子”的传承实则是“道家→儒家→道家”的复归。另外，孔门有德行、言语、政事、文学四科，颜子属德行科，子夏属文学科（《论语·先进》）；《庄子》从未提过子夏，却有十五个与颜子相关的场景（依次为：《人间世》1个、《大宗师》2个、《天运》1个、《至乐》1个、《达生》1个、《山木》1个、《田子方》3个、《知北游》1个、《让王》2个、《盗跖》1个、《渔父》1个）^②。章太炎把庄子的师承由子夏变成颜子，就韩愈无视《庄子》从未提过子夏而言，这是正本清源；就章学诚拿“子夏传经”做文章而言，这里蕴含从文献传授（文学科）转向德性成长（德行科）的深意。

1922年的《国学概论》让颜子出场，可以视为章太炎对其早年思想的否定与超越。章太炎1899年12月25日发表的《今古文辨义》有言：“孔子贤于尧、舜，自在性分，非专在制作也。昔人言禹入圣域而未优，斯禹不如尧、舜也；颜渊言欲从末由，斯颜不如孔也。此其比较，皆在性分之内，岂在制作哉！”^③颜子不是这段话的主角，但“颜不如孔”四字分外醒目。而立之际，章太炎是尊荀健将。1900年出版的《馗书初刻本》即以《尊荀》开篇^④。几年后的《馗书重订本》虽然删去《尊荀》，但其《订孔》仍说：“夫孟、荀道术皆躡绝孔氏，惟才美弗能与等比，故终身无鲁相之政，三千之化。”“荀卿学过孔子，尚称颂以为本师。此则如释迦初教本近灰灭，及马鸣、龙树特弘大乘之风，而犹以释迦为本师也。”^⑤与此相比，《国学概论》认为庄子的“无我”这一高深主张：“孟、荀见不到此；原来孔子也只推许颜回是悟此道的。所以庄子面目上是道家，也可说是儒家。”^⑥章太炎由早年尊荀到晚年尊颜，这一变化耐人寻味。

《国学概论》讨论颜、庄关系，因其说过“孔子传颜回，再传至庄子”，已可提炼为“庄生传颜氏之儒”，并与韩愈讲的“庄子本子夏之徒”大异其趣；因其说过“庄子面目上是道家，也可说是儒家”，又与韩愈开出的“庄子即儒家”议题同气相求。从论证方式、思想定位看，章太炎显然沿袭了韩愈的路数——不是原封不动地照着讲，而是推陈出新地接着讲。

首先，我们来看论证方式。不管是韩愈把庄子与子夏相比，还是章太炎把庄子与颜子相比，两者都是拿庄子与儒家相比，此其论证方式之同。一则以子夏，一则以颜子，仅是具体结论之异，无法遮

① 章太炎讲演，曹聚仁整理：《国学概论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9年，第35页。按，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。

② 参见崔大华：《庄学研究》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347—349页。按，该书以“次”表述欠妥，我们改用“场景/个”表述。

③ 汤志钧编：《章太炎政论选集》上册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7年，第109—110页。

④ 参见朱维铮校点：《馗书初刻本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编：《章太炎全集》（三）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4年，第7—8页。

⑤ 朱维铮校点：《馗书重订本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编：《章太炎全集》（三），第135页。

⑥ 章太炎讲演，曹聚仁整理：《国学概论》，第39页。

蔽论证方式之同。

其次,从思想定位看。韩愈的《送王秀才序》有言:“故学者必慎其所道,道于杨、墨、老、庄、佛之学,而欲之圣人之道,犹航断港绝潢以望至于海也;故求观圣人之道,必自孟子始。”^①意思是说:庄子虽是子夏后学,最终却归本道家,因此不能与孟子相提并论,反而是儒家眼里的异端。《国学概论》论“老子→(孔子→颜子)→庄子”与“道家→儒家→道家”的关联,亦是认为庄子先求学于儒家,后归依于道家。此其思想定位之同。为何如此?《国学概论·哲学之派别》讲道:“周秦诸子,道、儒两家所见独到;这两家本是同源,后来才分离的。”^②同源未必同归,庄子是“半途而废”的儒家,此乃韩愈、章太炎之同。

《国学概论·哲学之派别》还指出:

道家的庄子以时代论,比荀子早些,和孟子同时,终没曾见过一面。庄子是宋人,宋和梁接近;庄子和惠子往来,惠子又为梁相,孟子在梁颇久,本有会面的机会;但孟子本性不欢喜和人家往来,彼此学问又不同,就不会见了。^③

两宋学者讨论过孟子、庄子为何同时却互不相及,这也是与“庄子即儒家”议题相关的内容。1922年的沪上讲座不仅提出“庄生传颜氏之儒”,而且关注“庄孟互不相及”,足见章太炎已从消极的批评者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,“庄子即儒家”议题的分量变得越来越重。

三、颜氏之儒的传人

章太炎别号荻汉阁主^④,世称荻汉大师,著有《荻汉微言》、《荻汉昌言》、《荻汉雅言劄记》三种^⑤。《章太炎年谱长编》(增订本)记述《章氏丛书续编》(1933年北平刊本)有《荻汉昌言》6卷,并注“章氏国学讲习会另有单行本”^⑥。今人虞云国据高景成(1916—2009)的《章太炎年谱》所引《民国名人图鉴》的一段话,认为《荻汉昌言》成书于1925年以后^⑦。《荻汉昌言》1933年刊行,但成书时间较为模糊。有鉴于此,章门大弟子黄侃(1886—1935)的《寄勤闲室日记(辛未四月)》值得重视。

1931年5月31日,黄侃日记:“奉先生卅日书,又补《春秋疑义答问》五条,又说《文王受命辨》(师新作,附入《荻汉昌言》者)大意。与鹰若书,问所称《荻汉昌言》在予处之说。”^⑧《文王受命辨》当指《荻汉昌言·区言一》“西伯受命称王……何其自为矛盾欤”一段^⑨,加上“师新作”云云,表明《荻汉昌言》仍在创作之中。“问所称《荻汉昌言》在予处之说”^⑩,则显示手稿早就存于黄侃那里。6月1日日记:“遍搜篋中,果得师《荻汉昌言》手稿,亟书告鹰若。”6月14日日记:“得鹰若快书,内有补《昌言》稿廿九纸。”^⑪黄侃果然存有手稿,鹰若(孙世扬,1892—1947)又寄来补稿,可见《荻汉昌言》早已成其大端,

① 韩愈著,钱仲联、马茂元校点:《韩愈全集》文集卷四《送王秀才序》,第212页。

② 章太炎讲演,曹聚仁整理:《国学概论》,第35页。

③ 章太炎讲演,曹聚仁整理:《国学概论》,第37页。

④ “荻”,有大、明二义,音dào;章太炎读“倬”,音zhuō。1915年10月21日,章太炎致函夫人汤国梨:“吾寓称荻汉章寓,荻字音倬。”(汤国梨编次:《章太炎先生家书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5年,第81页。按,引文为引者释读并加标点符号。)荻,读音究竟如何?虞云国转述朱维铮之说:“蒙复旦大学朱维铮教授转告:太炎门人与家人皆读为zhuō,始使未能亲炙太炎的后代学人确知其读音。”(《本书说明》,章太炎著,虞云国标点整理:《荻汉三言》,沈阳:辽宁教育出版社,2000年,第3页)

⑤ 章太炎另有《荻汉闲话》一篇(参见《太炎文录续编》卷一,上海人民出版社编:《章太炎全集》(五),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1985年,第106—114页)。

⑥ 参见汤志钧编:《章太炎年谱长编》(增订本)上册,第544页。

⑦ 参见《本书说明》,章太炎著,虞云国标点整理:《荻汉三言》,第1—2页;《前言》,章太炎著,虞云国校点:《荻汉三言》,上海:上海书店出版社,2011年,第2页。

⑧ 黄侃著,黄延祖重辑:《黄侃日记》下册,北京:中华书局,2007年,第711页。按,书名号为引者所加,下同。

⑨ 参见章太炎著,虞云国标点整理:《荻汉三言》,第108—109页。

⑩ 马勇编《章太炎书信集》(石家庄:河北人民出版社,2003年)收《与黄侃(25通)》(第194—216页),惜无章太炎询问《荻汉昌言》在黄侃之处一通。

⑪ 黄侃著,黄延祖重辑:《黄侃日记》下册,第711、713页。

但时有增补，只是影响甚微，否则黄侃不会束之高阁乃至久则遗忘。

由黄侃日记与高景成写的年谱可知，《蒍汉昌言》的成书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断断续续的。大致说来，它成书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期，始于1925年之后，终于1931—1933年之间。这一判定不影响我们描述并评析章太炎论“庄子即儒家”的心路历程。

《蒍汉昌言·经言一》指出：

庄生传颜氏之儒，（颜氏之儒，见《韩非·显学篇》。）述其进学次第。《田子方篇》：颜渊曰：“夫子步亦步，夫子趋亦趋，夫子驰亦驰，夫子奔逸绝尘，而回瞠若乎后矣！”此盖仰高钻坚瞻前忽后之时也。《人间世篇》：仲尼告以心斋，颜回曰：“回之未始得使，实自回也；得使之也，未始有回也。”此与克己相应者也。《大宗师篇》：颜回曰：“回忘仁义矣。”仲尼曰：“可矣，犹未也。”他日复见，曰：“回忘礼乐矣！”仲尼曰：“可矣，犹未也。”他日复见，曰：“回坐忘矣。”仲尼蹴然曰：“何谓坐忘？”颜回曰：“堕肢体，黜聪明，离形去知，同于大通，此谓坐忘。”仲尼曰：“同则无好也，化则无常也。而果其贤乎丘也，请从而后也。”夫告以为仁之道而能忘仁，告以复礼而能忘礼，离形去知，人我与法我同尽，斯谓“克己”。同于大通，斯谓“天下归仁”。此其造诣之极也。世儒徒见其云瞠乎后者，以为贤圣相去，才隔一臂，望其卓尔力不能从，于是颜苦孔之卓之论起，遂成大谬，不悟仲尼方请从颜渊后也。盖非与仁冥，不能忘仁；非与礼冥，不能忘礼。所见一豪不尽，不能坐忘。忘有次第，故曰屡空。非谓一有一无，如顾欢之说也。由是言之，云其心三月不违仁者，尔时犹有仁之见也，逾三月则冥焉忘之矣。由仁义行，非行仁义，斯时违与不违皆不可说。（“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”，此子思述先君子语。盖难尽信。）^①

区别于《国学概论》讲“庄生传颜氏之儒”，《蒍汉昌言》不只是一语破的，更是条分缕析。“述其进学次第”既钩沉了《庄子》中的颜子形象嬗变史，又把颜子的德性成长纳入儒学解读之中。

谈《庄子》中的颜子形象嬗变，离不开与孔子进行比较。《田子方》以“瞠若乎后”写照颜子对于孔子的敬仰：“夫子步，亦步也；夫子言，亦言也；夫子趋，亦趋也；夫子辩，亦辩也；夫子驰，亦驰也；夫子言道，回亦言道也；及奔逸绝尘而回瞠若乎后者，夫子不言而信，不比而周，无器而民滔乎前，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。”^②《人间世》中的颜子，仍是虚心向孔子求教的学生。可到《大宗师》，面对颜子讲的“堕肢体，黜聪明，离形去知，同于大通，此谓坐忘”，孔子喟叹“请从而后”^③，孔颜关系出现根本变化。

凡是道德实践主体，无不心存德性成长的焦虑。颜子“瞠若乎后”于孔子，向善的企盼油然而生。孔子曾说：“回之为人也，择乎中庸，得一善，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。”（《礼记·中庸》）^④尽管章太炎不认可这种说法，但是，经由孔子告以“心斋”，直至颜子悟出“坐忘”，它确是颜子自身德性不断成长的必由之路。道德实践主体的德性一旦获得真切、圆融的成长，就能成为他人的榜样。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孔子是以“请从而后”于颜子。两个“后”字刻画了《庄子》版的孔颜乐处：颜子因“后”而天天向上，孔子因“后”而虚怀若谷，德性成长是相互促进的，向善永无止境；在终极意义上，成德达材实无孰先孰后、谁高谁低之分。

章太炎从《田子方》讲到《大宗师》，不是为了彰显“瞠若乎后”于孔子的颜子——这样做有可能沦于《法言·学行》所谓“颜苦孔之卓之至也”^⑤的地步，而是旨在表彰孔子“请从而后”的颜子。对于颜子，庄子尽是赞誉，章太炎则用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予以诠释：

颜渊问仁。子曰：“克己复礼为仁。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。为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？”

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

^① 章太炎著，虞云国标点整理：《蒍汉三言》，第69—70页。

^② 郭庆藩辑，王孝鱼整理：《庄子集释》下册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2年第3版，第703—704页。

^③ 参见郭庆藩辑，王孝鱼整理：《庄子集释》上册，第290页。

^④ 阮元校刻：《十三经注疏（附校勘记）》下册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0年，第1626页中栏。

^⑤ 参见扬雄撰，韩敬注：《法言注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2年，第22页。

子曰：“回也其庶乎，屡空。赐不受命，而货殖焉，亿则屡中。”（《论语·先进》）

子曰：“回也，其心三月不违仁，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。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

孟子曰：“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，庶民去之，君子存之。舜明于庶物，察于人伦，由仁义行，非行仁义也。”（《孟子·离娄下》）

为何心斋只是与克己相应？盖因它是孔子的教法，而非颜子的自证。从心斋到坐忘，克己又是必须的。坐忘分成两阶段：前一阶段，离形去知对应于克己^①；后一阶段，同于大通对应于天下归仁。为何同于大通是颜子造诣之极的体现？盖因它是颜子的自证，而非孔子的教法。世儒仅仅看到“瞠若乎后”于孔子的那个颜子，但孔子“请从而后”的这个颜子才是至关重要的。以往的颜子，“得一善，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”，“其心三月不违仁”；此时的颜子，“忘有次第，故曰屡空”，已臻“由仁义行，非行仁义”之境。先心斋再坐忘，且由心斋而入坐忘，方能从念念不忘地“行仁义”（理事无碍）升华至无适无莫地“由仁义行”（事事无碍）。坐忘高于心斋，坐忘是最高的道德实践境界。

把坐忘视作颜子的最高成就，如果从儒道互补之思看，它是庄子对颜子所作的道家化解读，属于儒家人物被道家化叙事，且在庄子哲学建构中举足轻重^②。换句话说，坐忘是道家而不是儒家的工夫一境界，颜子是以儒家身份登峰造极地领悟了道家的精髓。我们为何认为章太炎是从“庄子即儒家”议题看问题呢？这里可以把它与1915—1916年成书^③的《菡汉微言》作个比较。

《菡汉微言》第75、90则，亦论坐忘。第75则指出：“依何修习而能无意无我？颜回自说坐忘之境……自胜之谓‘克己’，慢与慢消，故云‘复礼’。我与我尽平等，性智见前，此所以‘为仁’也。颜回庶几之才，闻一知十，乍聆胜义，便收坐忘之效。”^④它既用“克己复礼为仁”阐释坐忘，又用“平等”、“性智”把颜子往佛学那边推，但没有用孔子说的“请从而后”来高度评价颜子的坐忘境界。第90则先是认为“颜渊坐忘，所至卓绝”，拿《成唯识论》验证一番之后，结论却是“颜渊始证初地，后证三地”，末尾还对“世人以佛法说孔、颜事，往往奢言无限，不相割切”批评了一通，因为坐忘并未达致四地——“微细我见烦恼永灭者，四地位也”^⑤。仅就这两则材料看，《菡汉微言》一则以佛解儒，坐忘自然算不上最大成就；二则庄子缺席，庄子与颜子没有对接起来，与“庄子即儒家”议题尚有极大的距离。

实际上，《菡汉微言》是章太炎论“庄子即儒家”由消极评论者到积极参与者的过渡环节，作用不可低估。《菡汉昌言》论坐忘，虽然也留下佛学的痕迹，但气象焕然一新，今非昔比。前文所述之外，《经言一》有云：“老以诏孔，其所就为无我；孔以诏颜，其所就为克己。”^⑥仿此，“颜以诏庄，其所就为坐忘”。《经言一》又把坐忘与静坐相勾连，并云：“《曲礼》曰：‘坐如尸。’常人不习止观，坐至一两刻许，不昏沉即妄念，昏沉者四体弛，妄念者容止变，安能如尸也！故知静坐乃礼家恒教，何容咤为异术？”^⑦藉此静坐、坐忘的礼家（儒家）本领，章太炎切断了儒家人物被道家化叙事（从属于儒道互补）的思路，成就了其论“庄子即儒家”的画龙点睛之笔——“庄生传颜氏之儒”。

“庄生传颜氏之儒”意味着：颜子一系儒学由庄子传承，庄子是颜氏之儒的传人。传颜氏之儒的庄子当然是儒家，而不是道家；坐忘不是道家的本事，而是儒家的至境。或者说，传颜氏之儒那个时期的庄子必然是儒家，即使他后来成了道家，当时也是以儒家身份，把颜子坐忘的工夫与境界记载并

① 《菡汉昌言·经言一》云：“克己有二：断人我见，则烦恼障尽，故人不堪其忧而颜子自不改其乐；断法我见，则所知障尽，于是离于见相。”（章太炎著，虞云国标点整理：《菡汉三言》，第69页）

② 参见杨海文：《“互文”与“互动”：儒道关系新论》，《福建论坛（人文社会科学版）》2005年第6期；杨海文：《化蛹成蝶——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断想》，济南：齐鲁书社，2014年，第157—158页。

③ 参见汤志钧编：《章太炎年谱长编》（增订本）上册，第296页。

④ 章太炎著，虞云国标点整理：《菡汉三言》，第28—29页。

⑤ 参见章太炎著，虞云国标点整理：《菡汉三言》，第33页。

⑥ 章太炎著，虞云国标点整理：《菡汉三言》，第68页。

⑦ 章太炎著，虞云国标点整理：《菡汉三言》，第70页。（按，《礼记·曲礼上》：“若夫坐如尸，立如齐……”，见阮元校刻：《十三经注疏（附校勘记）》上册，第1230页下栏）“如尸”意即直而不曲；“如齐”意即不左右长短，坐端正立，不歪不斜。

传承了下来。“庄子即儒家”议题不同于、并独立于人们习以为常的儒道互补之思,非儒道互补之思所能范围者,而是具有独特的思想史内涵,理应获得自身的思想史地位。

四、不骂本师

《章太炎年谱长编》(增订本)记述:1935年9月16日,章氏国学讲习会正式开讲,会址设在苏州锦帆路50号,“以研究固有文化、造就国学人才为宗旨”;其中有《诸子学略说》上、下篇,王乘六(1894-1980)等人记录,刊于《章氏国学讲习会讲演记录》第7、8期^①。据《太炎文录续编》卷首插页^②、《章太炎学术年谱》^③以及本文征引的《章太炎:在苏州国学讲习会的讲稿》,《诸子学略说》当作《诸子略说》。

《国学讲习会讲演记录》第四章《诸子略说》指出:

绝四之说,人我、法我俱尽。“如有所立卓尔,虽欲从之,末由也已”者,亦除法我执矣。此等自得之语,孔、颜之后,无第三人能道(佛、庄不论)。^④

子思作《中庸》,孟子作七篇,皆论学而及政治者也。子思、孟子既入天趣,若不转身,必不能到孔、颜之地,惟庄子为得颜子之意耳。^⑤

然则论自得之处,孟子最优,子思次之,而皆在天趣。荀子专主人格,不务超出人格,则但有人趣……至于孔、颜一路,非惟汉儒不能及,即子思、孟子亦未能步趋,盖逊乎远尔。^⑥

《庄子》书中,自老子而外,最推重颜子,于孔子尚有微辞,于颜子则从无贬语。^⑦

前面三段话包含先秦儒学传承的两条路线:一条是作为主流看法的“孔子(→曾子)→子思→孟子”,另一条是作为章太炎观点的“孔子→颜子→庄子”。第四段话是对1922年《国学概论》的温故知新。传承之旅上“惟庄子为得颜子之意耳”,《庄子》书中“最推重颜子”,加上“超出人格而不能断灭,此之谓天趣”^⑧的说明,它们相得益彰、相互支援,均是为了否弃主流看法,让“既竭吾才,如有所立卓尔。虽欲从之,末由也已”(《论语·子罕》)的颜子成为居于子思、孟子之上的先秦儒学传承者乃至集大成者,进而坐实庄子传颜氏之儒,且传的是孔门最优异的德行一科的观点。

就“庄子即儒家”议题而言,韩愈之后,苏轼(1037-1101)成为第二推手。其《庄子祠堂记》有云:“余以为庄子盖助孔子者……故庄子之言,皆实予,而文不予,阳挤而阴助之,其正言盖无几。”^⑨苏轼把庄子看作“阴奉阳违”的儒家,但《庄子祠堂记》又云:“然余尝疑《盗跖》、《渔父》,则若真诋孔子者。”^⑩

《国学讲习会讲演记录·诸子略说》指出:

杂篇有孔子见盗跖及渔父事,东坡以为此二篇当删。其实《渔父篇》未为揶揄之言,《盗跖篇》亦有微意在也。七国儒者,皆托孔子之说以糊口,庄子欲骂倒此辈,不得不毁及孔子,此与禅宗呵佛骂祖相似。禅宗虽呵佛骂祖,于本师则无不敬之言。庄子虽揶揄孔子,然不及颜子,其事正同。禅宗所以呵佛骂祖者,各派持论,均有根据,非根据佛即根据祖,如用寻常驳辩,未必有取

① 参见汤志钧编:《章太炎年谱长编》(增订本)上册,第554、559页。

② 《章太炎全集》(五)卷首有一插页影印《太炎先生讲演记录五种》的广告,第四种是《诸子略说》。

③ 参见姚奠中、董国炎:《章太炎学术年谱》,太原:山西古籍出版社,1996年,第475页。

④ 章太炎著,杨佩昌整理:《章太炎:在苏州国学讲习会的讲稿》,北京:中国画报出版社,2010年,第187页。按,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。

⑤ 章太炎著,杨佩昌整理:《章太炎:在苏州国学讲习会的讲稿》,第187-188页。

⑥ 章太炎著,杨佩昌整理:《章太炎:在苏州国学讲习会的讲稿》,第190页。

⑦ 章太炎著,杨佩昌整理:《章太炎:在苏州国学讲习会的讲稿》,第209页。

⑧ 参见章太炎著,杨佩昌整理:《章太炎:在苏州国学讲习会的讲稿》,第187页。

⑨ 苏轼著,孔凡礼点校:《苏轼文集》卷十一《庄子祠堂记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86年,第2册,第347页。

⑩ 苏轼著,孔凡礼点校:《苏轼文集》卷十一《庄子祠堂记》,第2册,第348页。按,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。

胜之道,不得已而呵佛骂祖耳。孔子之徒,颜子最高,一生从未服官,无七国游说之风。自子贡开游说之端,子路、冉有皆以从政终其身。于是七国时仕宦游说之士,多以孔子为依归,却不能依傍颜子,故庄子独称之也。东坡生于宋代,已见佛家呵佛骂祖之风,不知何以不明此理,而谓此二篇当删去也。^①

章太炎不赞成苏轼删去《渔父》、《盗跖》,而是认为它们与禅宗呵佛骂祖相似。由苏轼出发,并把庄子骂孔子视作呵佛骂祖,这一比拟可以焦竑(1540—1620)的《读庄子七则》为代表:

史迁言庄子诋訾孔子,世儒率随声和之,独苏子瞻谓其实予而文不予,尊孔子者无如庄子。噫!子瞻之论,盖得其髓矣。然世儒往往牵于文而莫造其实,亦恶知子瞻之所谓乎!何者?世儒之所执者,孔子之迹也,其糟魄也;而庄子之所论者,其精也……释氏之论训恩者,必诃佛詈祖之人。夫以诃佛詈祖为训恩,则皈依赞叹者为倍德矣。又孰知夫诃与詈者,为皈依赞叹之至也!不然,秦佚之吊,尝非老聃矣;栗林之游,又尝自非矣,而亦谓诋訾聃、周也,可乎?^②

你要对佛教感恩,就得诃佛詈祖。骂得越厉害,感恩越彻底。诃、詈之至,才是皈依、赞叹之至。焦竑贯彻苏轼“实予文不予,阳挤阴助之”的思路,认为《渔父》、《盗跖》两篇不是真要诋毁孔子,而是类似于诃佛詈祖以酬恩,“尊孔子者无如庄子”。

庄子骂孔子,有似禅宗呵佛骂祖,此乃章太炎与焦竑之同。《诸子略说》又云:“惟所谓儒者乃当时之儒,非周公、孔子也。其讥弹孔子者,凡以便取持论,非出本意,犹禅宗之呵佛骂祖耳。”^③言外之意,庄子骂的不是孔子,而是骂假托孔子之说以糊口的七国儒者。“于本师则无不敬之言”,则是章太炎与焦竑之异。祖师可骂,所以《庄子》对孔子尚有微辞;本师不可骂,所以《庄子》对颜子从无贬语。章太炎突出本师一义,旨在夯实他晚年一直坚持的“庄生传颜氏之儒”命题,亦即庄子是颜氏一系儒学的传人;至于战国游士“多以孔子为依归,却不能依傍颜子,故庄子独称之也”,则重在凸显庄子以颜子为师的根据不是世俗政治,而是内在超越的德性。

庄子尽管以颜子为本师,但并未沿着儒家的精神方向一路走下来。从庄子的思想追求看,《国学概论》认为:自由、平等是庄子的根本主张^④。《诸子略说》则指出:“……逍遥者,自由之义;齐物者,平等之旨。”“必也一切都空,才得真自由,故后有外天下,外物之论,此乃自由之极至也。”“庄子以为至乎其极,必也泯绝是非,方可谓之平等耳。”^⑤从庄子与老子的关系看,《国学概论》尝言:“庄子自以为和老子不同,《天下篇》是偏于孔子的。但庄子的根本学说,和老子相去不远。”^⑥《诸子略说》亦云:《庄子》是“自老子而外”,方“最推重颜子”^⑦。在章太炎看来,庄子有其根本主张,且与老子相去不远,因而是“半途而废”的儒家。

五、“章太炎曾有此说”

以上逐一分疏了章太炎论“庄子即儒家”的五种文献:第一种是1906年发表的《论诸子学》,第二种是1908年发表的《与人论国学书》,第三种是1922年讲演并出版的《国学概论·哲学之派别》,第四种是成书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期的《蒯昌言·经言一》,第五种是1935年讲演并发表的《国学讲习会讲演记录·诸子略说》。

就“庄子即儒家”议题而言,早年章太炎尚属消极评论者,晚年章太炎已成积极参与者。他晚年

① 章太炎著,杨佩昌整理:《章太炎:在苏州国学讲习会的讲稿》,第212页。按,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。

② 焦竑撰,李剑雄点校:《澹园集》卷二十二《读庄子七则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99年,第293页。按,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。

③ 章太炎著,杨佩昌整理:《章太炎:在苏州国学讲习会的讲稿》,第213页。

④ 参见章太炎讲演,曹聚仁整理:《国学概论》,第37—38页。

⑤ 章太炎著,杨佩昌整理:《章太炎:在苏州国学讲习会的讲稿》,第210页。

⑥ 章太炎讲演,曹聚仁整理:《国学概论》,第37页。

⑦ 参见章太炎著,杨佩昌整理:《章太炎:在苏州国学讲习会的讲稿》,第209页。

始终把庄子当作“半途而废”的儒家——此乃与韩愈之同，甚至把庄子当作“阴奉阳违”的儒家——此乃与苏轼之同，却从未把庄子当作“彻头彻尾”的儒家——此乃与第三推手觉浪道盛(1592—1659)及其《正庄为尧孔真孤》之异^①。从现代庄学史看，“庄生传颜氏之儒”这一画龙点睛之笔的影响最大。

郭沫若(1892—1978)于1944年9月写成的《庄子的批判》(收入《十批判书》)指出：

韩愈疑庄子本是儒家。出于田子方之门，则仅据《外篇》有《田子方篇》以为说，这是武断。我怀疑他本是“颜氏之儒”，书中征引颜回与孔子的对话很多，而且差不多都是很关紧要的话，以前的人大抵把它们当成“寓言”便忽略过去了。那是根据后来所完成了的正统派的儒家观念所下的判断，事实上在孔门初二代，儒家并不是那么纯正的，而儒家八派之中，过半数以上是已经完全消灭了。^②

《庄子》书中虽然很多地方在菲薄儒家，如像《杂篇》中的《盗跖》、《渔父》两篇更在痛骂孔子，但那些都是后学者的呵佛骂祖的游戏文字，而认真称赞儒或孔子的地方，则非常严肃。^③

庄子是从颜氏之儒出来的，但他就和墨子“学儒者之业，受孔子之术”而卒于“背周道而用夏政”一样(《淮南·要略》)，自己也成立了一个宗派。^④

读完上面三段话，不熟悉郭沫若的人可能会说：这不是章太炎讲的吗？在“我怀疑他本是‘颜氏之儒’”之下，郭沫若自注：“章太炎曾有此说，曾于坊间所传《章太炎先生白话文》一书中见之。”^⑤这个自注有点简单(从现代学术规范看)，甚至疑点重重(当另文详论)^⑥，但足以说明：郭沫若从颜氏之儒切入并展开“庄子即儒家”议题，章太炎是其功不可没的第一引路人。

1958年，李泰棻(1896—1972)出版《老庄研究》。该书下卷《庄子研究》引过郭沫若“我怀疑他本是‘颜氏之儒’”那段话^⑦，又写道：“……韩愈据《田子方篇》为说，疑周系儒家，出于子夏之门；姚鼐附和其说(见《庄子章义·序》)。章实斋亦同(《文史通义·经解》)。章太炎疑系颜氏之儒，郭沫若附和其说(见《十批判书》一八七页)。”“章氏辩其非出于子夏之门之说固是，但认为庄周系颜氏之儒者更非。我认为他并不是颜氏之儒。”^⑧李泰棻依据《章氏丛书·别录》^⑨，认可章太炎对于庄子出于子夏之门的批判。这里说的《章氏丛书·别录》，亦即《太炎文录初编》别录卷二《与人论国学书》。李泰棻批评章太炎提出的庄周系颜氏之儒，但并未出具第一手文献，而是转引自《十批判书》。这是“章太炎曾有此说”由郭沫若传承下来的显著例证。

1960年，钟泰(1888—1979)写的《庄子发微序》有云：

予向亦尝以为庄子殆兼孔、老两家之传，及今思之，是犹不免影响之见。庄子之学，盖实渊源自孔子，而尤于孔子之门颜子之学为独契，故其书中颜子之言既屡见不一，而若“心斋”，若“坐忘”，若“亦步亦趋”，“奔轶绝尘，瞠若乎后”云云，皆深微精粹不见于他书。非庄子尝有所闻，即何从而识之？更何得言之亲切如此？故窃谓庄子为孔门颜子一派之传，与孟子之传自曾子一派者，虽同时不相闻，而学则足以并峙。^⑩

① 参见觉浪道盛：《天界觉浪盛禅师全录》卷三十《正庄为尧孔真孤》，蓝吉富主编：《禅宗全书》第59册，北京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，2004年，第729—730页。按，笔者拟对韩愈、苏轼、觉浪道盛与“庄子即儒家”议题进行深入探讨，这里只是粗略言之。

② 郭沫若：《十批判书》，北京：东方出版社，1996年，第194页。

③ 郭沫若：《十批判书》，第194—195页。

④ 郭沫若：《十批判书》，第201页。

⑤ 郭沫若：《十批判书》，第194页。

⑥ 详细讨论，参见杨海文：《庄子本颜氏之儒：郭沫若“自注”的思想史真相》，《江苏行政学院学报》2016年第3期。

⑦ 参见李泰棻：《老庄研究》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58年，第149页。

⑧ 李泰棻：《老庄研究》，第181—182、182页。

⑨ 参见李泰棻：《老庄研究》，第182页。

⑩ 钟泰：《庄子发微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年，第2—3页。

20世纪60年代初期,钟泰、李泰棻同在东北文史研究所讲国学^①。从“庄子即儒家”议题看,李泰棻属于消极评论者,反复提到“章太炎曾有此说”;钟泰属于积极参与者,而且是“庄子本颜氏之儒”的集大成者,却闭口不谈章太炎、郭沫若。钟泰写《庄子发微》不引近人之说,私下里却时有点评。“文革”前夕,《庄子发微》由东北文史研究所出资影印200册。据李吉奎回忆:“书中序言是钟老亲笔写的,在定稿本上,他指给我看,某句是有所指的。说这句话,大概是让后人知其本心。”^②其时,《十批判书》一版再版,郭沫若如日中天。钟泰长期研究《庄子》,岂能按捺得住读《庄子的批判》的冲动?即便读后不以为然,却附带知道或者更加知道了章太炎,当是情理中事。所以,“章太炎曾有此说”由郭沫若传承下来的隐微例证,有可能正在“某句是有所指的”之中。

回到章太炎与“庄子即儒家”议题。成书于1910年代中期的《菑汉微言》第74则有一段话,可由以窥测章太炎由消极评论者转变为积极参与者的某种心迹:

喻以此土成事,如孔子所言著在《论语》,而深美之说翻在庄周书中。庄周述孔,容有寓言,然而频频数见,必非无因,则知孔氏绪言遗教,辞旨闳简,庄生乃为敷衍其文。总纪于彼,而成文于此,事所宜有。子曰“六十而耳顺”,明为自说阶位之言,而耳顺云何,莫知其审。庄周述之则曰:“听止于耳,心止于符。”“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……鸣而当律,言而当法,利义陈乎前,而好恶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。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薰,立定天下之定。”耳顺之旨居然可明。^③

《论语·为政》的“六十而耳顺”,《庄子·人间世》的“若一志,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,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!听止于耳,心止于符。气也者,虚而待物者也。唯道集虚。虚者,心斋也”^④,都是孔子说的话。把它们勾连起来,心斋即是耳顺之旨。再由“孔子所言著在《论语》,而深美之说翻在庄周书中”,“庄周述孔”成为章太炎新的问题意识,而与他在过去“以佛解庄”^⑤有所不同。加上前面讨论过的第75、90则,《菑汉微言》论孔子、颜子,论心斋、坐忘,论“庄周述孔”,仿佛已为后来的“庄生传颜氏之儒”埋下伏笔。一旦章太炎成为“庄子即儒家”议题的积极参与者,这一切就会由量变到质变,脱胎换骨地孕育出“庄生传颜氏之儒”的画龙点睛之笔。

崔大华(1938-2013)认为:康有为(1858-1927)的《万木草堂口说》、谭嗣同(1865-1898)的《北游访学记》、梁启超(1873-1929)的《论支那宗教改革》均支持韩愈首倡的庄子出子夏之门,而章太炎讲“庄生传颜氏之儒”,目的在于显示他与改良派的全面对立^⑥。循此思路,章太炎与康有为的对立还

① 参见黄中业、孙玉良:《共和国教育史上的国学书院式学府——东北文史研究所述要》,《社会科学战线》2015年第1期。

② 李吉奎:《我师钟泰》,《羊城晚报》2015年8月27日,B3版。

③ 章太炎著,虞云国标点整理:《菑汉三言》,第28页。按,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。《庄子·寓言》:“庄子谓惠子曰:‘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,始时是,卒而非之,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。’”(郭庆藩辑,王孝鱼整理:《庄子集释》第4册,第952页)《庄子·则阳》:“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,未尝不始于是而卒诎之以非也,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。”(同上书,第905页)

④ 参见郭庆藩辑,王孝鱼整理:《庄子集释》上册,第152页。

⑤ 章太炎早年以《齐物论释》名家。梁启超尝言:“炳麟用佛学解老庄,极有理致,所著《齐物论释》,虽间有牵合处,然确能为研究庄子哲学者开一新国土。”(《清代学术概论》,北京:东方出版社,1996年,第86-87页)又云:“章太炎的《齐物论释》,是他生平极用心的著作,专引佛家法相宗学说比附庄旨,可谓石破天惊。至于是否即《庄子》原意,只好凭各人领会罢。”(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,北京:东方出版社,1996年,第287页)《齐物论释》言庄子:“又其所志本在内圣外王,哀生民之无拯,念刑政之苛残,必令世无工宰,见无文野,人各自主之谓王,智无留碍然后圣,自非顺时利见,示见白衣,何能果此愿哉。”(王仲荦校点:《齐物论释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编:《章太炎全集》[六],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1986年,第57页)这段文字,《齐物论释定本》亦大致相同(王仲荦校点:《齐物论释定本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编:《章太炎全集》[六],第119-120页)。这里所谓“内圣”,意即自度;所谓“外王”,意即度他。质言之,乃以佛解庄。

⑥ 参见崔大华:《庄学研究》,第346页注①。

体现为：“百日维新”失败之后的几年，康有为把《论语》、《礼运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当作“新四书”^①，殚精竭虑地作注；1930年代，章太炎则把《孝经》、《大学》、《儒行》、《丧服》当作“新四经”^②，不遗余力地宣扬。

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以降，打倒孔家店、激烈反传统成为时代潮流。当年叱咤风云的改良派、革命派风光不再，不少人从政治型思想家变身为思想型学者，其文化社会工作的政治含量剧减，文化学术工作的社会含量日增。梁启超1920年以《清代学术概论》完成自我转型^③，章太炎大讲国学以维系神州慧命^④。1922年的《国学概论》第五章为《结论——国学之进步》，章太炎提出经学“以比类知原求进步”，哲学“以直观自得求进步”，文学“以发情止义求进步”^⑤。1934年2月9日，章太炎手书《论以后国学进步》的题词：“一，经学以明条例求进步；二，史学以知比类求进步；三，哲学以直观自得求进步；四，文学以发情止义求进步。”^⑥章太炎晚年藉助听者云集的国学讲座，积极参与“庄子即儒家”议题，反复讲“庄生传颜氏之儒”，饱含反弹时尚、情深古典的苦心孤诣，亦是其精神文化生命的自画像——心斋乃六十耳顺之工夫，坐忘乃七十不逾矩之境界。

时至今日，“庄子即儒家”议题一则大多数人闻所未闻，二则消极评论者占绝对优势。它看起来是可爱而不可信的思想史八卦，其实是自身具有独特内涵的思想史议题，颇为值得现代庄学、儒学（尤其是孟学）研究联合作战，辑录其文献资料，理清其发展线索，敞开其思想含义，唤醒其时代诉求。我们把章太炎的相关论述摘录出来并略作探讨^⑦，就是为了不再犯“以前的人大抵把它们当成‘寓言’便忽略过去了”的过错，进而使得“庄子即儒家”议题逐渐能被人们熟悉、理解乃至认可。

[责任编辑 李梅 邹晓东]

① 康有为曾注解《大学》，但正文已佚，仅存序言，可见历史影响不大。《康有为全集》据现藏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的手稿，发布康有为1902年8月（光绪二十八年七月）写于印度大吉岭的短文《〈大学注〉序》。序言说道：“戊戌之难，旧注尽失，逃亡多暇，补写旧义。”编者写的题注指出：“此文又载《不忍》杂志第六册（1913年7月出版），内容较手稿有增益。今据手稿点校，与《不忍》本互校。”（康有为撰，姜义华、张荣华编：《康有为全集》第六集，北京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355页）以上材料承蒙康有为研究专家、中山大学哲学系马永康先生告知，特此致谢。另，有关康有为对于《大学》的基本看法，参见马永康：《康有为论〈大学〉》，《现代哲学》2016年第2期。

② 章太炎写于1933年1月的《国学会会刊宣言》有云：“于是范以四经而表以二贤，四经者谓《孝经》、《大学》、《儒行》、《丧服》，二贤者则范、顾二公。”（《太炎文录续编》卷三，上海人民出版社编：《章太炎全集》（五），第158页）

③ 参见杨海文、毛克明：《从“政治型思想家”到“思想型学者”：梁启超1920年的身份嬗变》，《现代哲学》2002年第4期。

④ 章太炎逝世后，鲁迅写的《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》有言：“……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，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，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，和时代隔绝了。”“一九三三年刻《章氏丛书续编》于北平，所收不多，而更纯谨，且不取旧作，当然也无斗争之作，先生遂身衣学术的华衮，粹然成为儒宗，执贽愿为弟子者甚众，至于仓皇制‘同门录’成册。”（《且介亭杂文末编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73年，第67、69页）作为“五四”健将的鲁迅其实并不理解他曾经的老师章太炎。

⑤ 参见章太炎讲演，曹聚仁整理：《国学概论》，第76页。

⑥ 汤志钧编：《章太炎年谱长编》（增订本）上册，第545页。该书原阙“二”，引者据文意补充。按，《章太炎全集》（五）卷首有该题词的手迹影印件，编者把“后”误释为“张”。有论者亦把“条例”误释为“修伪”（参见蒋国保：《章太炎国学观述评》，《孔子研究》2012年第4期）。

⑦ 细读章太炎晚年论“庄子即儒家”的三种文献，我们发现：涉案内容着墨不多，只占《国学概论·哲学之派别》、《蕤汉昌言·经言一》、《国学讲习会讲演记录·诸子略说》之一小块，但都置于讲儒家而不是讲道家的部分。章太炎讲儒家，时刻想到庄子，盖因他认定庄子是传承颜子一系儒学的传人。章太炎娓娓道来，但未环环相扣；我们断章取义，却得瞻前顾后。“庄子即儒家”议题的研究难度，由此可见一斑。另外，从章太炎整个的庄学看，以佛解庄是其显著特色，但“庄子即儒家”议题与以佛解庄究竟是什么关系，这一根本问题只能留待日后再思。